

# 试论莎士比亚对曹禺早期戏剧创作的影响

胡亮宇<sup>1</sup>, 侯业智<sup>2</sup>

(四川大学 文新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延安大学 教务处,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 莎士比亚戏剧对曹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读者在解读他们的剧作时可以发现诸多暗合之处, 二人的戏剧表现出如下共同特征: 男性主人公性格的懦弱犹疑, 在潜意识层面都流露出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 情节安排上“复仇”主题的渗透; 超自然的意象设置。这种借鉴与摹仿是曹禺出于重建中国民族精神, 唤醒国人自我独立意识需要的必然之举。

**关键词:** 曹禺; 莎士比亚; 戏剧创作; 性格; 复仇

**中图分类号:** I 2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10)-04-0045-04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史上, 曹禺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制高点位置, 他的话剧成就代表着当时中国戏剧的最高水平, 评论界曾称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一方面说明他的话剧在中国之份量相当于莎翁之于英国; 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了二者的戏剧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之处。虽然曹禺的传记中并未直接点明他的创作借鉴于莎士比亚, 但是我们在解读中却发现他们的剧作表现出许多惊人的相似特征, 由此可见, 莎士比亚戏剧对曹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 一 人物: 懦弱犹疑的性格与“俄狄浦斯情结”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 处于自发反抗阶段的工人与还没有觉醒的小市民, 占了当时中国“不幸的大多数”, 出生于封建家庭的曹禺目睹了封建家族制牢笼中禁锢着的青年的悲剧与挣扎, 痛感于国民的痼疾对民族精神的损蚀, 所以在他早期的几部剧作中, 我们看到的男性主人公性格懦弱犹疑, 缺乏自立与自我意识, 而他们在性格的具体表征方面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主人公有着惊人的相似。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麦克白等人是作者在人文主义时代推出的精神楷模、灵魂斗士, 莎翁在《哈姆雷特》中借王子盛赞人类是“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他们代表当时资产阶级所要求的“人”的意识的觉醒, 个性主义的高涨。然而这些万物灵长依然有着自己无法弥补

的缺陷, 在戏剧中表现出天性的犹疑退缩, 面对重大决定时显得缺乏果敢的决断精神。哈姆雷特是一个典型的长于思想短于行动的人物。当他从灵魂口中得知父王是被残忍的叔父所害, 便彻底沉溺在悲哀与愤慨的泥潭中无力自拔, 道义与责任的夹击甚至使他只能以疯狂来掩盖内心的屈辱与悲痛, 他哀痛地喊着: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 唉, 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sup>[1]110</sup>然而在履行拯救万民于危难的责任时, 他却时时犹疑不决, 在自己进行心灵拷问时信誓旦旦, 一旦改朝换代的计划需要付诸实施时又表现得懦弱迟疑, 几次错失良机, 险些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李尔王》中的李尔虚荣偏信, 宁愿相信奸佞的谎言而对忠心耿耿的小女儿百般苛责, 国土沦落被赶出家门后在悔恨与忧伤中孤独死去。奥赛罗虽然身为千军不敌的将领, 却因为轻信伊阿古的毁谤而迁怒挚友凯西奥, 扼杀妻子苔丝德蒙娜, 嫉妒的怒火将他的理智舔舐得一干二净, 未曾思考就痛下杀手毁己毁人。麦克白这个昔日战功赫赫的英格兰大将, 被野心勃勃的妻子几句谗言诱惑而投入阴谋的策划, 麦克白夫人的几句独白道明了他性格中的弱点: “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 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 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 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 你不是没有野心, 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sup>[1]398</sup>麦克白天性犹豫, 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 常被他人的思想左右, 最后落得惨死复仇剑下的结局。

莎士比亚剧中的悲剧人物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格上的

收稿日期: 2010-04-08

作者简介: 1. 胡亮宇(1988-), 陕西延安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级学生; 2. 侯业智(1983-), 男, 陕西横山人, 文学硕士, 现任职于延安大学教务处。

懦弱犹疑、长于思想短于果敢的行动，而曹禺剧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兼具了这些性格特征甚至将其更进一步的深化。《雷雨》中的繁漪堪称 20 世纪现代文学中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典范，然而却将高傲的个性与坚韧的生命付于周萍，一个无力承担重任的“美丽的空形”：他“如生在田野的麦苗移植在暖室里，虽然也开花结实，但是空虚脆弱，经不起现实的风雷”，<sup>[12]46</sup>孤独寂寞中被美丽热情的继母吸引，却因为这种情感背负着乱伦的罪名而仓皇逃避，他时时在自责与忧郁中挣扎，父亲与世俗的压力使他先天不足的身体与心灵更加孱弱，惶恐中抓住“活得像个人”的四凤，却又因为四凤身份的卑下不敢公布于众。他的懦弱性格类似于哈姆雷特，他们都渴望自己能担当起为国为家、为爱搏击的重任，却因为外界环境的压力被迫退回内心。周萍与哈姆雷特处在同样的地位，鲁大海曾指出四凤与周萍悬殊的地位注定四凤只能忍辱受屈，而雷欧提斯也告诫奥菲莉亚：“他有这样高的地位，他的意志并不属于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要被他的血统所支配。”<sup>[11]10</sup>他们共同的家庭血统为其性格行动处处受限埋下了祸根，思想背负了太多顾忌就无法迅捷地做出决策，因此，周萍与哈姆雷特的悲剧也在情理之中。《日出》中的方达生与《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同样具有这种懦弱的气质，方达生徒有革命与斗争的热情而无实际的经验，他怀揣着正义的理想，却天真地低估了对手的力量：“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势力。他不过是一个人。”经受了无情的打击以后才看清黑暗的现状并不是自己单薄的力量可以改变，只得自我放逐到平凡的生活中。《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更是一个在封建家庭中磨钝了锋芒、丧失了个性的社会的“残废”，他“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说话，懒于走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重苦力的事情”，<sup>[13]383</sup>即使面对关系自己一生幸福的感情也表现得懦弱无用，他疲惫麻木的神经衰弱得经不起一丝风浪，只能任由别人左右他的思维。他们与麦克白、奥赛罗等人都有共同的死穴即轻信，容易为他人的思想左右，因此他们在性格上表现的特征与结局如出一辙。

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具有相似性的地方在于他们在潜意识都流露出浓厚的“俄狄浦斯情结”，这鲜明地表现在《雷雨》与《哈姆雷特》两部剧中。哈姆雷特对叔父无比的憎恶，一方面归因于父权的旁落，而更多的是由于母亲的再嫁。他在叔父的庆功宴后痛苦的独白将这种心境表露无疑：“那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不愿让天风吹痛她的脸庞……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它们的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仓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可是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噤住我的嘴！”<sup>[14]97</sup>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恋母情结由两种因素构成，即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恨。正因为叔父夺走了他深爱的母亲，使他在精神上空虚无依，因此对叔父的厌恶成为必然，而他

的装疯卖傻理解为有意博取母亲的怜悯也未为不可，当他杀死躲在幕后偷听的波各涅斯，为父复仇而装疯的真相暴露后他痛斥母亲：“你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让淫邪熏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并恳求母亲拒绝克劳狄斯无耻的求欢，清心寡欲，拯救灵魂。这一切举动看起来实在不像儿子对母亲改嫁的反应，而是面对情人背叛时遏止不住的恶语相向。对母亲潜在的依恋之情，时时影响着他的思维与决断，也是他最终下决心谋刺克劳狄斯的真正动因。而《雷雨》中的周萍与繁漪、四凤的爱情，则更明确地体现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周萍因为童年失去母爱，在乡下的屈辱更加剧了他对缺失的母爱的渴望。当他遇见繁漪这个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却已为人母的女性，隐藏在童年记忆中从未熄灭的恋母情愫复燃，对继母产生了不该产生的感情。在与繁漪偷情时他发誓他恨自己的父亲，“愿他死，就是犯了天伦的罪也干”，<sup>[2]65</sup>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仇父”心理的典型表现，与哈姆雷特逼迫母亲离开叔父眠床的感情并无二致。他在意识到与繁漪的不正常关系会被父亲与舆论打压时，将这种感情全力压抑下去，却不经意地将其转移到了另一个母爱的替代品——四凤身上。虽然周萍事前并不知道他与四凤有同母异父的血缘关系，但他对四凤的选择，实际上是他对母亲形象的寻找，也许因为潜意识中嗅到四凤身上母亲的气息，他才再次燃起生命的希望，甚至说出了自己从前不敢说的话：“哼，我怕，我怕什么？（管不住自己）这些年，我做出这样许多……我的心都死了，我恨极了我自己，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我能放开胆喜欢一个女人，我反而怕人家骂？哼，让人家说吧，周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怕什么，我喜欢她。”<sup>[2]61</sup>怯懦自卑的周萍这番慷慨陈词，实在出于内心一种强烈的感情信念：守护自己身边母爱般的温暖不被剥夺。周萍所受的是封建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教义的熏陶，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内心潜隐的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否则他定会忍痛掐灭它。但当他的两次爱之希望落空，甚至最终跌入乱伦罪孽的深渊，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他的命运也不容遏止地走到了尽头。真相大白后他面无惧色地饮弹自尽，留下一句使人不忍卒听的遗言：“爸，你不该生我！”这是他万般绝望的写照，也是他多舛命运的浓缩，不禁让人联想到因杀父娶母难辞其咎而自戳双眼的俄狄浦斯。与同样因为母爱失落绝望戮奸、在坦然中死去的哈姆雷特也有莫大的相似之处，而剧中的周冲与鲁大海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恋母意识，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 二 情节：复仇主题的渗透

复仇，是东西方文学叙事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最常见的情节模式便是杀戮—仇恨—报仇的链条结构，周而复始的行为循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往往以“蒙冤—申诉—昭雪”这一形式再现人生

的艰辛历程。古代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便是“复仇”的最佳诠释。莎士比亚戏剧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悲剧这一复仇模式。《哈姆雷特》在搬上银幕时直接更名为《王子复仇记》，而曹禺将中西方传统戏剧艺术观念巧妙融合在一起后，也在他的剧作中渗透着这一主题。

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都以复仇作为叙事主线。《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丹麦国王被害，兄弟克劳狄斯抢夺王位霸占王后，王子哈姆雷特替天行道，惩治了奸徒为父报仇的故事。《李尔王》中李尔因受蒙蔽将国土分给奸恶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却使忠心耿耿的小女儿流落异国，李尔失权后被逐出国土，落魄之际遇忠臣相护，得与三女儿重逢，除掉狠毒的大女儿二女儿，亦是复仇的曲折历程。《奥赛罗》中的奥赛罗听信伊阿古谗言杀害了心爱的妻子苔丝德蒙娜，真相大白后他愤怒地杀死了恶毒的诽谤者拔剑自刎。莎士比亚选取复仇情节表现主题，展示善于恶、美与丑的搏击，最终突显其对高尚品格、健全人性的赞颂，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受莎士比亚影响，曹禺也将复仇这一主题渗透在他的剧作中。《原野》以仇虎逃出监狱回乡复仇为主线，通过他激烈的言辞与怪异的行为揭示他强烈的仇恨心理，他奇丑无比的外貌是内心为巨大的仇恨压迫至扭曲的外现，焦阎王是其复仇的对象，但他的死使仇虎的仇恨指向落空，于是复仇的目标转移到焦母、焦大星身上，最后竟出乎意料地致使无辜的小黑子成为刀下冤魂，在名义上完成了仇虎的复仇历程。而仇虎因为强烈的内心自责陷入灵魂的迷顿，焦母恐怖的叫魂声使他无力逃脱血腥幽暗的纠缠，最后死在黑林子中，实际上又是一出复仇悲剧宣告完结，而无止境的“冤冤相报”还在继续，“父债子偿”、“父仇子报”的传统思想渗透于整个作品的潜在背景。《日出》中李石清因为生活的拮据与在潘月亭面前遭受的屈辱，时时渴望翻身与潘月亭一较高下。当他无意中获得了潘不愿被人抓住的把柄后便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在潘的面前趾高气扬，只是因为自身力量的薄弱很快遭到潘的反戈一击而彻底破产。方达生怯弱天真，但旅馆腐朽肮脏的糜烂生活使他意识到社会的罪恶，人性的颓废，特别是小东西的死深深刺激他，促使他向腐败的社会发出复仇的宣言。而《雷雨》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复仇者形象与复仇行为，但周公馆在全剧最后一幕中上演的母子相认兄妹乱伦的惨剧，实质上正是一种复仇的结局——对周朴园在20年前对待萍所犯的不可饶恕的罪孽的报复，对他始乱终弃行径的惩罚，而周萍也为他的勾引继母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暴风雨之夜恐怖的轰雷，诡异的闪电，对世界中挣扎的生命的打击，正是所谓的“上天”、“命运”、“造化”对愚昧妄行的人间的复仇，对他们毁灭人伦、破坏自然规则的无情报复。

因此，曹禺在剧作中将复仇主题渗透于故事的细枝末节，也是对当时非正义势力和黑暗社会的诅咒，既是对传统戏剧模式的继承，也是对西方戏剧内蕴的采纳，而这又与莎士比亚之戏剧主题不谋而合，表现出结构与叙事

话语的一致性。

### 三 创作技巧：超自然意象的设置

曹禺曾坦言，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技巧上给予他很多启发，比如莎士比亚闭幕与开幕的手法使他受益匪浅。但对曹禺戏剧影响更大或者说两人在创作技巧上更近似的，是他们作品中超自然意象的设置及象征主义的运用。

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带有神秘玄奥的色彩，因为，他在创作中安排的一些超乎人力与自然范畴的景物或意象，给戏剧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诸如《哈姆雷特》第一幕时夜色中显现的可怖的幽灵，虽然是作者一种交待故事缘由的技巧，却因为以灵异的外表出现而给人以神秘的感觉。《李尔王》中的暴风雨，《麦克白》中神秘的女巫与妖精，她们口中“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等等奇异的预言，使作品具有神话的色彩。莎士比亚利用自古希腊以来人们意识中普遍存在的神秘主义思想，灵异信仰，让灵魂及一切象征自然神力的意象具体地呈现，更深刻地表达主题，因为“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超自然现象都总是和一个活生生的悲剧人物的思想与观念联系在一起”。<sup>[4] 129</sup>曹禺在创作戏剧时借鉴了莎士比亚这一技巧，同时也由于他自小接触基督教，宗教的宣教与表达上的独特途径给予他的戏剧以西方化的元素，更接近莎士比亚时期的戏剧原型，曹禺也将一系列超自然的意象放置在剧中，他曾在《〈日出〉跋》中说：“《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几个傀儡。”<sup>[2] 386</sup>这是一个神秘的没有形象的角色，但却时时在场并以一种人性化的姿态操纵着剧情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看作是《雷雨》中时常出现的电闪雷鸣的狂暴景象。当周公馆中窝藏的罪恶与悖论膨胀到无以为继之时，“雷雨”以狂厉的姿态显形并毁灭了地上的一切，以示人间的阴暗与造化的公正对抗之中前者的必然覆亡。《原野》的神秘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其中的超自然意象直接做为戏剧的背景与主体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迷宫般难以逃离的阴森恐怖的树林，紧随仇虎与金子身后无法摆脱的灯笼，四野遍布的幽怨凄寒的鬼火，甚至那具有超常感觉能力的瞎眼的焦母，都具有超越自然本身的意义。而仇虎幻觉中出现的成群结队的鬼魂、地狱中焦阎王幻化的阎罗王，与《麦克白》中班柯的鬼魂及其他幽灵具有同样的气氛点染作用，是曹禺借鉴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技巧的结果。

当然，曹禺对这种技巧的借鉴又决非皮毛式移植，而是对它做了更深刻的完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设置的幽灵意象，隐喻了当时丹麦国混乱无序，天怒人怨的惨像，也为哈姆雷特的复仇铺设了移步的台阶。但曹禺向莎士比亚借鉴的这种意象设置技巧是深得其精髓，并且做了东方式的艺术处理，使这些意象在形式上带有浓密的神秘色彩，而实质上却有着浓厚的象征意义。如“雷

雨”、“闪电”、“鬼魂”、“阎罗”等是人们在观念中信奉并恐惧的物象,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但在戏剧中的运用则可以衬托人物矛盾痛苦的心境,凸显封建伦理道德及阶级压迫对人民的毒害之重,摧残之紧,既营造了引人注目的神秘戏剧氛围,又烘托出了人物与内在、外界命运抗争时的艰难,呼应了“五四”思想启蒙、人性革新的主题。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兴盛,那时欧洲封建主义的统治已日渐衰颓,资本主义正在崛起。思想家与艺术家们强烈呼吁“人”的自由与解放,要求打碎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人的热情、勇敢、个性精神被充分强调,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的领袖,这种要求在他的作品中更加鲜明,他对人性强烈的呼唤,“宇宙的精华、万物灵长”作为千百年来高扬个性主义旗帜的经典口号传唱不休。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劣根性及伴随而来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欺诈、掠夺、拜金主义等腐朽风气不断恶性膨胀,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探索便笼罩上一层浓重的感伤阴影。他笔下的人物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如哈姆雷特的犹疑懦弱,李尔与奥赛罗的偏执轻信,麦克白的野心私欲,但莎士比亚并未因此而否决他们,他们在他们身上依然看到了人性的闪光之处,看到他们内心的善与恶、正义与邪祟的强烈冲突,这表明他们灵魂深处的光明人性和正义感并未消亡。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创作中,“浪漫激情讴歌的,就是被压抑,被摧残的正义

和人性抗击邪恶势力和非人性所迸发出来的奇光异彩与浩然之气”。<sup>[5]</sup>而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自由思潮鼓舞的曹禺,痛切地感受到封建社会、封建伦理观念枷锁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的劈杀,人们面对黑暗无处逃避的悲剧困境。正如他谈自己创作《雷雨》时的心得说:“对那时眼前的社会印象太深刻了,非常厌恶那个社会,觉得那个社会不会长久的”,“我亲自讲过的、看过的、亲自经历过的那么多令人愤慨的坏人坏事,都使我感到这个社会非改变不可。”<sup>[6]</sup>他亲眼看到黑暗如地狱般的社会,把如周萍、方达生、曾文清这样的青年迫害扭曲成为懦弱无能、懒于思考行动的寄生物,他们在人世间孤苦无依地蠕动着,任凭哪种外力都可以迅速使之毁灭。从而将对人性思索融入当时的启蒙、批判潮流,意在通过暴露国民的愚弱,以图建立独立的自我意识,更新民族精神的血液。他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积极汲取西方戏剧的审美因素和艺术技巧,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构建本民族的现代戏剧,对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于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戏剧大家,我们无法硬性将他们的创作思想与剧作主题放置在同一平台上加以对比,但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一些共同点,或许有利于理解他们相似的创作心理,也能更深刻地理解曹禺戏剧艺术之所以取得杰出成就的卓拔之处。

#### 参考文献:

- [1]朱生豪. 莎士比亚悲喜剧[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
- [2]曹禺. 曹禺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3]曹禺. 曹禺经典作品选[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 [4][美]阿·尼柯尔. 西欧戏剧理论[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5: 129
- [5]焦尚志. 曹禺与莎士比亚悲剧观念之比较[J]. 戏剧, 2000(4).
- [6]田本相.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M]//曹禺剧作论.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李莉)

## A Study of Shakespeare's Impact on Cao Yu's Early Play Writing

HU Liang-yu<sup>1</sup>, HOU Ye-zhi<sup>2</sup>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2. Office of Teaching Affairs,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s plays have exerted an imperceptible influence on Cao Yu for numerous resemblances can be found in their plays as is manifest as follows: weak and hesitant heroes with a strong "Oedipus Complex" subconsciously; the omnipresence of the "revenge" them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pernatural images in plot arrangement. Reference and imitation of this kind is an inevitable act for Cao Yu to reconstruct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and to awaken the self-independenc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Cao Yu; Shakespeare; play writing; character; revenge